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urals in Khitan Tomb of Liao Dynasty and Th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Zhang mingxing^{1,2,a}

¹College of fine art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China

²School of fine arts, Hulunbuir University, Hailar, Inner Mongolia, China

^azmxdc@163.com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depth excavation of archaeology, a large number of murals in Qidan Tomb of Liao Dynasty have been found, which has attracted a very wide range of attention in Archaeology and art circles. Khitan is a nomadic people in the north. Its social system is slave society and the Khitan believes in Shamanism. Therefore, it has its own unique funeral form. Khitan 's ancestors once practiced tree burial, without the mature funeral mode of the Han nationali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Khitan Nation, it widely absorbed the funeral culture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From the currently discovered Khitan Mural Tombs, we can clearly see its absorption and reference of the murals in the tomb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is paper will take thi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tomb murals deeply with nomadic characteristics produced by Khitan tomb murals in Liao Dynas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uneral culture and tomb mural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Keywords: the murals in Khitan tombs of Liao Dynasty, influence, the funeral culture, the murals in tomb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辽、契丹墓室壁画与唐、宋墓室壁画的渊源关系

张明星^{1,2,a}

¹ 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长春, 吉林, 中国

² 呼伦贝尔学院美术学院, 海拉尔, 内蒙古, 中国

^a zmxdc@163.com

摘要

近年来随着考古的深入挖掘, 辽代契丹墓室壁画被大量发现, 在考古和艺术界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契丹属于北方游牧民族其社会制度为奴隶社会, 并崇信萨满教, 因此有着自己本民族独特的丧葬形式。契丹的先民曾经一度实行树葬, 没有汉族成熟的丧葬模式。在其建国后广泛吸收唐、宋的丧葬文化, 从目前已知发现的契丹壁画墓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契丹对唐、宋墓室壁画的吸收和借鉴。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 深入探讨辽代契丹墓室壁画在受到唐、宋丧葬文化和墓室壁画影响下产生的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墓室壁画。

关键词: 辽契丹墓室壁画 影响 丧葬文化 唐、宋代墓室壁画

1. 辽契丹墓室壁画与唐墓室壁画的关系

唐代经济繁荣、地域辽阔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契丹部落壮大时期正是唐朝初年(公元七世纪初)当时契丹的部落首领是大贺氏。契丹部落原先臣服于突厥, 在漠北草原建立政权, 唐高祖时(公元618—624年)契丹先后遣使者入唐朝贡, 太宗贞观二

年契丹部落归附唐朝, 至窟哥任部落联盟首领时唐朝在契丹的驻牧地归唐朝政府直接管辖[1]。纵观唐与契丹的关系错综复杂、即有朝贡、入仕和互设贸易也有战争和掠夺。然而正是通过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契丹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丧葬上受中原先进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都是十分明显的。唐朝继承隋制在墓室壁画乃至丧葬等方面都形成了完整的模式。唐代墓葬有百分之八十在首都长安, 有着严格的丧葬礼制,

并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规范模式和时代特征鲜明的丧葬的礼仪制度,同时在墓葬形制壁画的配置等方面都进行了统一与规范。李星明在其博士论文《唐墓室壁画研究》一文中根据唐墓室壁画的分布将唐代墓室壁画的形制概括为“唐京畿模式”[2],是指“唐代陕西关中一带的墓葬形制,墓主人成员一般是皇室成员和王宫大臣等,这一规制一般包括墓室结构和壁画配置方式两部分”。唐代的墓室壁画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世俗图像和神瑞图像”,这两个部分经常同时出现在墓室中。这种配置在后来的契丹丧葬文化中被广泛的吸收借鉴,无论是墓葬的形制还是壁画的技法等方面都被积极的吸收与创新,融合草原民族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性。也正是这种交流与融合使得契丹民族的墓室壁画从无到有再到繁荣。契丹墓室壁画在吸收和借鉴唐墓室壁画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上。

1.1. 唐代丧葬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中原丧葬文化经过秦汉的长时间的发展到了唐代以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丧葬礼仪制度,墓葬从地下到地上形成了完备的整体,拥有了供后人祭祀礼仪的享殿、神道和供奉死者的地宫。在丧葬文化上有着的一套成熟的模式。契丹早期属部落民族统治下的奴隶社会制度,早期宗教信仰主要以萨满教为主,丧葬形式主要流行天葬和树葬,所以对于墓室和壁画也就无从谈起了,但是到契丹建国初期契丹与唐广泛交流、融合与吸收,契丹的丧葬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契丹对唐的文化吸收从历史的记载中就可以十分清晰的看出其脉络。辽代帝国的疆域十分辽阔东至于海(今东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北至胘胸(今蒙古国克鲁伦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当时契丹与唐及其西方国家交流十分频繁。从辽上京向西沿着当时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证据研究表明草原丝绸之路确实存在,是契丹与西方及唐文化交流的唯一通道,参阅《辽上京研究论文选》巴林左旗文史资料九)很多唐代的能工巧匠、文化、瓷器、以及西域的工艺品等相继传入契丹,尤其是唐文化与契丹的交流十分频繁深远。在通辽已经发掘的契丹皇族耶律羽之墓中就先后出土了多件带有浓郁特色的西域和唐朝的金银瓷器等日常用品陪葬。在众多的陪葬品中有一件墓主人生前用过的出自唐邢窑白瓷大碗,最有代表性的是大碗底部写着一个“盈”字款。据史料记载此款碗是唐代刑窑专门为皇家御用定制的“盈”字款碗。由此也可以看出契丹与唐的文化经济交流是十分频繁的。

契丹人信仰萨满教和佛教,对于生死轮回观念及其崇信,因此唐朝的厚葬之风很快就被契丹贵族所吸收与借鉴。契丹建国初期很多唐代画工及其丧葬习俗随着与契丹的交流来到草原并很快被契丹贵族所接纳,如、唐中期时组成丧葬活动的“丧、葬、祭”三部分丧葬模式很快都被契丹人所借鉴。汉唐时的地宫与地上的享殿都是墓葬的一个整体。契丹部落时期是没有地宫和享殿建设的,即使是契丹部落酋长也只是实行火葬或者树葬。与唐交流之后契丹的丧葬形制发

生了很大的改变,对地上的享殿都广泛的吸收了唐制,契丹的很多贵族墓葬在地下建有地宫绘有壁画,在地上则建有供人民祭祀的享殿。在考古发掘中有很多墓室都建有享殿的遗址,只不过是契丹的墓葬在金灭辽时绝大部分都被盗掘和破坏了,在加之长达九百年的历史中已经很难在找到其地上的遗迹了。正是应为契丹广泛的对唐制的吸收与借鉴才改变了契丹原始树葬与火葬,使其死者的灵魂在墓室中有了永久的家园和归宿,当然佛教从唐的传入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墓室的规制上契丹也吸收了唐制,唐代的墓葬多为方形大墓,整个墓室由斜坡墓道、天井、甬道和方形穹顶组成。这种墓室的结构和布局是唐人对皇家宫苑和府邸的一种模拟,这种斜坡墓道带有天井和穹顶的规制也被契丹贵族所吸收利用。契丹早期同样也流行大型方墓,在墓道及四壁、天井绘有壁画,用壁画来装饰墓室。这正是由于对唐文化交流与吸收的结果,唐墓葬的规制及制作方法技巧等都在早期契丹墓室壁画中有所体现。从而也形成了早期契丹以唐文化为积淀的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为主的具有特色的契丹墓室壁画。

1.2. 对唐代墓室壁画题材的吸收与借鉴

唐代墓室壁画以其大气磅礴,造型准确在中国壁画史上享有重要地位,虽经历一千年多的历史风尘但是保存的却较为完整。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我们仍能够看到唐墓室壁画的雍容华贵,在近半个世纪的考古挖掘中出土近 120 多坐壁画墓其中大部分都保存完整。这些壁画无论从色彩上还是造型上都堪称中国墓室壁画珍品。随着唐与契丹的文化交流唐代的很多画工随着草原丝绸之路来到北方,这些画工不仅仅带来了唐墓室壁画的绘画技巧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壁画摹本,这大大地丰富了契丹墓室壁画的内容。契丹墓室壁画早期主要以男女侍者、持骨朵的侍卫、各种纹饰及造型简练人物简单的牧放图为主,由于唐文化的传入许多新的壁画题材相继出现在契丹墓室壁画中,很多墓室壁画都受到了唐壁画的影响,如在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 M1、M2 墓中的墓道左右两侧均有男女侍从和各种中原地区的纹样,如四神、鹤、莲花等形象。在宝山 M1 墓室中还绘有高逸图、降真图等壁画明显是受到了唐文化的影响。四神的出现则说明唐墓室壁画祥瑞图像在契丹墓室壁画中的体现,带有唐代审美标准的侍女形象的出现唐文化中找到了其原始形象。

牡丹仙鹤等题材的花鸟画兴盛于唐,在唐代出现了专门擅长画牡丹花鸟的画家边鸾,牡丹仙鹤以特有的内在含义被唐人广泛运用在墓室壁画中。从出土的唐墓室壁画中能够找到很多带有牡丹、仙鹤等图像的壁画。但是这种仙鹤、牡丹的题材在几千里外的漠北草原也同样在墓室壁画中流行。列如在赤峰解放营子晚期辽墓中亦出现了凤凰牡丹鸟蝶图,在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墓墓门上也绘有牡丹图,在韩匡嗣家族墓

中也出土了祥云瑞鹤图。在漠北草原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牡丹是不可能生长的,由此可见在契丹墓室壁画中出现的牡丹、仙鹤等形象正是文化交流的结果。龙凤是汉族的图腾,是汉族人的信仰但是这种形象却在契丹贵族墓室中频繁的出现,如在赤峰市哈拉哈达辽墓的棺材上就绘有凤凰的图案,在韩德威墓中出土的龙凤石棺图样式非常的精美绝伦。这些图案在以游牧狩猎著称的民族中是没有文化根基的,但由于文化的交流这些代表着汉族的符号也走进了契丹的文化生活中。在宝山 M1、墓中还出现了带有唐文化内涵的《寄锦图》、《诵经图》和 M2 中的《降真图》,这两幅壁画经学者考证是唐代较为常见的壁画题材。其中《诵经图》在唐代时曾为《杨贵妃教鹦鹉诵经图》,《寄锦图》则为《苏若兰织寄回文锦》,其壁画非常精美,色彩浓艳,笔法十分细腻明显具有唐代风貌。据吴玉贵对宝山辽墓壁画《诵经图》和《寄锦图》的考证揭示了画的内容《明皇杂录》所记杨贵妃调教鹦鹉颂经故事,表达闺怨的苏若兰寄回文锦故事的关系推测其粉本可能就是唐人张萱、周昉的“织锦回文回文”和“贵妃教鹦鹉图”。这些带有唐文化的壁画应出自唐画工之手或是唐代粉本的传入契丹画工的临摹在创作。

契丹墓室壁画中诸如牡丹、仙鹤、龙凤等形象的出现,《诵经图》等题材的传入正是文化交流结果。这种文化交流使其远在漠北边陲的草原游牧民族在吸收了唐墓葬形制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唐画工和其所带来的壁画题材,正是这些题材的传入使契丹墓室壁画无论从内容、题材上还是规模上都有很大的改变,并被不断的发扬,使其成为墓室中不可或缺的装饰内容。

1.3. 对唐代墓室壁画技法上的吸收与创新

唐代墓室壁画历经秦汉、魏晋等朝代的发展,在数量和制作技法上已经达到了规模空前、技法精湛,壁画制作精美的朝代。然而由于契丹远离经济文化中心,深居漠北草原过着游牧生活,所以其墓室壁画的发展在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与唐文化的交流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契丹墓室壁画广泛地吸收了唐中原墓室壁画的技法、葬制及其图式。首先、在壁画的制作方法上我们能够看出其与契丹壁画的共同性,唐代的墓室壁画在制作过程中一般先在墙面制作一遍底子,底子一般由粉土、沙子以及少量植物纤维如麦草、麻等按照一定的比例加水调制而成,并在其上粉刷一层,干后打磨平整方可起稿构图。这一制作过程从目前契丹出土的壁画中可以看出其制作方法与唐壁画大致相同,早期契丹平民墓室的壁画制作较为粗糙,壁面不太平整,墙皮多脱落,更有甚者画工直接在墙上勾勒出较粗的线条并施以色彩。而契丹贵族墓则在壁面的制作上非常精细,有着严格的程序,壁面打磨的较光滑平整并涂以白灰在其上起稿做画,因此在众多出土的辽墓壁画中至今保存完好,色泽较为鲜艳,这全部得益于唐代墓室壁画技术的传入。其次、在壁画的制作技

法人物造型上看更是有许多的共性。唐代墓室壁画在其制作好的底子上多用墨线勾勒起稿,然后在勾好的人物造型上填色赋彩,其色彩多用矿物质颜色如红、赭、绿、白等几种色彩为主,尤其是晕染的技巧和方法在唐广为流传和发扬,在运笔方法上唐墓室壁画多用有粗细变化的兰叶描,这样使人物线条变化有度,形象生动,同时吴道子“莼菜条”的运用和当时的影响力在很多墓室壁画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形体转折处多为弧形,具有“曲铁盘丝”的遗韵,画面中人物线条精劲有力,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形象,人物的真实性和感染力都增强了,如唐墓惠庄太子墓壁画、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都体现了此类风格。此时的契丹墓室壁画从出土中可以看出壁画起稿后均用墨线勾出形体,早期运用矿物质颜色平涂的较多,中后期壁画多用晕染法。在线条的运用上早期壁画线条多粗糙生涩(很可能是对毛笔工具的不熟练所致)有些壁画创造性的运用写意的笔法,形象生动,神形兼备,但是这样的运笔多在契丹小型墓室壁画中,大型壁画较少见,如克旗二八地一号辽墓《草原牧放图》《契丹人驻地生活小景》等。契丹贵族墓室壁画大多明显吸收了唐壁画的线条和敷色方法,如在库伦一号辽墓中画面采用工笔重彩的画法(吸收了唐李思训、李昭道青绿山水画法),笔锋刚劲有力、动感流畅,充分发挥了以线造型的特色。在用线上也有所区别,在描绘契丹男侍及引马出行时其衣纹线粗壮挺拔有力,从所描绘的身着圆领长袍的胸前中线来看都是粗厚的皮毛和毡毛织物,有力的线条突出了其质感,而描绘鼓乐手及契丹贵妇人的衣纹则纤细而流畅,表现了丝或布柔软的质感。这些基本上继承了唐壁画中用线的精劲有力和衣纹吴带当风的线描艺术风格。(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美术史料 1990 年 6 月版苏日台编著)从壁画人物造型和风格上来看唐代人物侍女在辽中期引入契丹并保留了唐代侍女肥硕圆润的经典造型这在契丹很多侍女形象中均有所表现。如韩国嗣墓甬道起居侍女图和起居执扇侍女图、辽上京哈拉哈达棺材辽墓起居仕女图等壁画都能看到契丹壁画对唐侍女肥硕之美的表现和借鉴。另外库伦一号辽墓出土的南北两壁门神无论在形象上还是在服饰及面部上都吸收了唐代门神的精髓,画法上明显带有唐五代人物画的风格。因此契丹墓室壁画在吸收唐文化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制作过程上还是在技法及人物形象上都吸收和借鉴了唐墓室壁画。也正是应为对唐壁画的吸收和借鉴才使得契丹墓室壁画有了长足的发展,把一个漠北游牧民族的墓室壁画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2. 辽契丹墓室壁画与宋墓室壁画的关系

辽契丹在建国中后期随着李唐王朝的覆灭契丹对唐文化的吸收逐渐转向正在崛起的宋朝。随着辽宋边境冲突的不断加剧,辽大举侵略宋,从而引发了辽对中原文化经济的大规模掠夺。公元 1004 年宋辽两国签订“檀渊之盟”,双方规定互设贸易,从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开始,北宋中期的富弼曾经说过“自契丹侵取燕蓟之北,拓拔自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

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3]。从中可以看出契丹在侵入宋的过程中不仅是对宋的经济同时也对其文化人才的大举掠夺，大批的中原汉人工匠被契丹人掠夺到漠北草原，统治者效法中原统治方式，大兴儒教、佛教接受中原的伦理道德，正是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契丹的墓室壁画也逐渐随着宋画工匠人的北迁而受到影响。

2.1. 宋墓室壁画在技法与题材上对辽契丹墓室壁画的影响

宋朝在绘画技法上以达到了中国绘画史的顶峰，尤其是在工笔山水、花鸟人物上名家辈出技法纯熟，对中国绘画史影响深远。因此、宋代的美术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宋朝墓室壁画方面亦集中了一批优秀的民间画工为其服务。

宋朝的墓室壁画从绘画技法上来讲人物造型严谨，线条流畅，壁画的制作水平精美，但是壁画墓的主人多为宋朝的地主乡绅，而高官显族的墓室绘有壁画的非常的少，所以其壁画较唐和辽的规模都小，出土的壁画数量也不及唐和辽。宋朝的壁画在人物形象特征及壁画题材上主要有仕女图、备茶图、妇人启门图、孝行图、开芳宴饮图等为主。壁画人物的造型生动人物形象带有典型中原汉人的特征和服饰。这些人物的用笔技法及人物造型能从辽代壁画中看出其影响的影子。在内蒙古巴林右旗林西县的辽庆陵出土了残存的壁画风景四季山水图春、夏、秋、冬，这四幅是连续的壁画（这种壁画形式在宋代的墓室壁画中多出现）壁画中用工笔的手法晕染，描绘了漠北草原四时山水，山峦起伏、草木旺盛画面构图别致主次分明、透视准确，画工对远山、草木、鸿雁的处理手法非常的到位，从中可以看出宋朝山水画的影响。日本考古学者鸟居龙盗掘庆陵后根据残存壁画研究后认为“以上人物山水等绘画为五代及北宋时代的作品所谓北宋画者是也”，从鸟居龙的推断上和宋朝山水画的发展比较上可以看出庆陵壁画和宋朝的画工是分不开的，当然也不排除是辽代自己的画工借鉴了宋朝上水画所画的，因为在辽代很多契丹人通过辽宋两国交流收买了很多宋朝的著名山水画家的作品，效仿临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耶律倍、耶律提子、胡瓌父子、萧蓉、高益等人。

在辽与宋交界的幽云地区这种文化的碰撞则更为明显，由于地处边境地区，互市贸易较为频繁，契丹族汉化程度也比较高，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4]。所以已经出土的辽代壁画与宋的壁画非常的接近（这种相似程度还包括其他的葬俗葬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北京西郊西翠路辽墓、洪茂沟辽墓、彭庄 M1M2 辽墓、百万庄 M1M2 辽墓中均发现壁画，绘有官吏、花鸟、奴仆等形象，在北京南郊发掘出土的赵德均墓（约公元 937 年到 985 年）壁画多以残毁，现存左中室共绘九人，其中三人身着红袍，头戴展脚璞头正在欣赏

一幅画，其余接童仆。在 1979 年北京门头沟清理的斋堂辽墓在东西两侧各描绘两个侍女，两壁绘人物故事画，整个画面布局、设色、线条、画面节奏都十分精细，人物形象十分生动，较有代表性的是散乐图。在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与 1971 年春发现了规模较大的壁画墓，其年代大约为辽天庆六年（1116 年）为大型墓葬群，其壁画的绘制精美复杂，人物造型准确，点茶图、车马出行图、开芳宴饮图、仙鹤、祥云、花卉等图案，尤其是其壁画中出现的娱乐图、开芳宴饮图、从宋墓室壁画中都能够看出其影响。在河南禹县发现的白沙宋墓中出土了较为精美的伎乐图，在其壁画中宋代的乐舞伎乐对声乐、器乐、舞蹈、等方面都做了全面细致的描绘，壁画中所使用的乐器如横笛、排箫、琵琶、笙、鼓等乐器，在河北宣化辽墓中都能够找出共同点。无论是人物的造型服饰乐器等，同时在库伦旗六号辽墓中出土的乐舞图也能够发现其所受宋墓的影响。从二者人物造型和服饰及演奏的乐器上都能够看出辽墓壁画在宋墓壁画的影响下的结果。宋代的开芳宴出土的比较多，主要集中在北宋时期的两京地区，即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等地区，其图像较有代表性。研究宋墓的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对其进行详细的考证，认为夫妻宴饮与乐舞图像与古书中所记载的开芳宴场景十分相似。宋墓中出现开芳宴的主要墓葬有河南禹县的白沙宋墓、登封高林壁画墓、河南新安县宋村砖雕壁画墓等墓室壁画。这类题材在唐代墓室壁画中很少见但在宋辽墓室中却较多件。

2.2. 宋墓室壁画仿木结构的大量出现对辽墓的影响

宋代的墓葬形制和规模有了一些变化，墓葬形制除了唐代常见的砖室墓还开始流行仿木建筑砖雕。“这类仿木结构的兴盛与宋代建筑业的发展及木作坊有关系，稍有财力之家都要按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来修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摘自中国墓室绘画研究 汪小阳主编 192 页）^[5]。带有仿木结构的宋墓较多，有明确年代的宋墓室壁画从咸平三年（公元 1000 年）到咸淳元年共有 40 余处，如河南三门峡 M49、湖北襄樊油坊岗 M3、河南新县下庄河墓、河南新安县宋村墓等。受其影响在辽代墓葬中同样也出现仿木结构的如 1989 年清理发掘的封山屯辽墓、河北宣化辽墓 M5 为仿木结构双室砖雕，北京南部地区赵德钧墓，北京大兴青云店 M2、河北怀安张家屯辽墓等都有仿木结构的出现，所以从中可以看出辽代的墓室壁画吸收了宋的一些葬制结构。其中影响较大的仍是辽宋交界的幽云地区，其地多居汉人，文化交流密切，契丹人的生活习俗随着汉人的习俗而改变，从墓葬中即可以看出幽云地区墓葬多似宋墓而与漠北契丹人墓室壁画有较大的差距。

宋代的文化经济及至墓葬文化在辽宋对峙的 100 多年里深刻地影响了辽代经济文化及丧葬，墓室壁画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在其中我们能够看到宋文化的渗

透和两国艺术交流的痕迹，然而也正是这种文化间的交流使辽代的墓室壁画大放异彩，成为中国壁画史上最后辉煌的篇章，从此中国墓室壁画走向了没落，墓室壁画渐隐渐现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3. 结论

唐、宋的墓室壁画都处在中国古代墓室壁画的高峰期，由于契丹王朝和唐、宋均有密切的文化和经济往来，因此、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辽契丹墓室壁画。契丹的墓室壁画无论是在题材、内容的选择上，还是在画面设色技法上都与唐、宋墓室壁画有着相似性。辽、契丹墓室壁画并非孤立的向前发展的，而是在与唐、宋的文化、经济交流后吸收和借鉴了中原的文化，使契丹墓室壁画在历史上占有非常高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墓室壁画最后的绝唱。

REFERENCES

- [1] Yuan, Tuotuo, *Liao History*, 1974, Zhonghua Book Company, Beijing.
- [2] Li Xingming, *Study on Murals in Tombs of Tang Dynasty*, 2005, Shanxi People's Art Publishing House, Shanxi.
- [3] Chen Shu, *The Manuscrip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Khitan*, 1963, Sanlian Bookstore.
- [4] Chen Shu, *Khitan Political History Manuscript*, 1986,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5] Wang Xiaoyang, *Research on Chinese Tomb Painting*, 2010,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Shanghai.